



青铜器

曾國

ZENG GUO QING TONG QI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青銅器
|
曾國

ZENG GUO QING TONG QI

ISBN 978-7-5010-2184-0



9 787501 021840 >

定价：400.00 元

曾国 青铜器

ZENG GUO QING TONG QI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 豫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编辑：段书安
罗亚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青铜器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010-2184-0
I. 曾… II. 湖… III. 青铜器 (考古) — 简介 — 中国 —
战国时代 IV. 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334 号

曾 国 青 铜 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文博利奥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 1194 1/16 印张: 29.5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184-0 定价: 400.00 元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凡 例

1. 本书著录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之外的曾国青铜器。收录重点为容器，车马器及兵器只择要收录，其重复较多者，不一一述及。本书收录资料时间截止为 2007 年 6 月。
2. 由于时间的变迁，不少青铜器的收藏单位都有变化。本书只记录目前的收藏单位，对其馆际变迁情况不作说明。
3. 本书中涉及的青铜器称重记录分别以克、千克为计量单位，以区别不同称量工具的精度。
4. 统计铭文中称为“类次”的，表示铭文的一些因素在不同的作器者和器类中的出现频率。如曾仲旂父壶，两件壶的器、盖 4 次出现相同的铭文，为一个“类次”。
5. 为便于描述，凡圆腹三足器，与双耳平行的两足（由前而视）中，左侧的一个称为 1 号足，右侧的为 2 号足，另外与双耳垂直的一足称为 3 号足。
6. 铭文的释文一般采用现代通行文字。另外，释文中以□表示缺字、以◻表示残字。
7. 各器群皆以出土地的小地名命名，若同一地点出土多个器群，则以出土年代区别。如随州熊家老湾 1970 年、1972 年两次出土的青铜器，分别称为 70 熊家老湾、72 熊家老湾。
8. 引用书目简称：
《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4-1998 年。
《周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 年。
《断代研究》：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引得》：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 年。
《辑证》：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9. 为便于读者查阅，铭文如在《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 年）、《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 年）著录，则注明其著录编号，两部书名分别用其简称：《集成》、《近出》。
10. 凡属于本书著录的材料，在本书其他部分叙述时，不另作注释。

曾国青铜器及其反映的地域问题

曾国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1]，因此曾国是以出土青铜器来确定其性质与地位的。曾国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多，在周代诸侯国中十分突出。追溯曾器的发现，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就刊有曾师季隳盘。近代见于著录的曾国青铜器已经不在少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列有曾伯冢簋等十件七类器。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共存关系的曾国青铜器，从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曾仲旂父”九鼎七簋器群开始，屡有发现。迄今为止，既便略去曾侯乙墓等战国时期青铜器不计，此前阶段的曾国青铜器仅礼器的数量就有30批、件数接近200件，这在周代诸侯国之中是十分突出的。这些青铜器的年代、性质以及曾国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国家对应等问题，曾经引发学术界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经过我们对曾国青铜器及其出土区域的考古工作，已有条件对曾国青铜器的一些基础问题如年代特征、疆域范围、中心区域等作一探讨^[2]。

[1] 由于曾国铜器集中分布的区域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是随国所在，曾国铜器无法与文献记载的随国相对应，故被称为“曾国之谜”。参见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又载于《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2] 本文的曾国是指鄂北豫南出土曾国青铜器所代表的国家，不指山东之曾国。这里也不拟讨论曾国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随、缙等国的对应关系问题。

[3]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4] 刘彬微、王世振：《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李家浩：《从曾姬无卣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

[5] 郭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6]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7]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关于曾国青铜器的年代及特征，学者们过去已经作了一些工作^[3]，但大家的看法仍然多有分歧。由于不少新的材料的发现，现在对年代系列和文化特征的总结，可以更为成熟一些。

目前所见性质明确的曾国青铜器，早至西周晚期，最晚延续至战国中期。约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曾国灭于楚^[4]。这样，曾国的年代下限大体可定，但上限或者说西周晚期之前的曾国遗存则尚未有确切的依据。因此目前讨论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只能局限在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一段时间。

从大的变化来看，曾国青铜器可分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两大阶段。两个阶段的文化特征、属性有较大的差异。

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基本组合以鼎、簋为核心，常见鼎、鬲、簋、壶、盘、匜组合，绝大多数器物只是装饰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垂鳞纹等几种纹饰。这一阶段的曾国青铜器又可划分为三期（附图一）。

第一期：以随州淅水地区的几批青铜器为代表，主要有70和72均川熊家老湾^[5]、安居桃花坡M1和M2^[6]、随州义地岗M83^[7]等几批青铜器。这一期铜器组合不甚规律，但鼎、簋的核心地位明确，有的器群组合上再加一套盘、匜的水器，另外鬲和甗也较常见。70熊家老湾出土有四件曾伯父簋、提梁卣、鬯等，等级较高。不过这组青铜器未必为墓葬所出，组合关系并不完整。除此之外，本期不见级别更高和组合更齐全的青铜器群。在器物形制方面，本期尚不见附耳

鼎。装饰纹样中少见窃曲纹。带冠团身的龙纹频繁出现是本期一个突出的特征。不少器物形制与周原等西周中心区域青铜器完全相同,如重环纹半球形腹鼎、带盖敛口瓦纹(或瓦纹结合重环纹)簋等等。本期各群青铜器还各包含有一些西周中期特征的铜器,如桃花坡M1的长颈垂腹壶、桃花坡M2的倾垂腹弦纹鼎、72熊家老湾和义地岗M83的高圈足盘等等,他们的器形或纹饰具有西周中期阶段特征或其遗形。考虑到这一期青铜器特征与下一期极其接近,本期年代应当在西周晚期。

第二期:以京山苏家垅^[8]、随州何店何家台^[9]、枣阳郭家庙M17^[10]等青铜器群为代表。本期有苏家垅、何家台两个青铜器群组合较齐全的例子,因此可以推测当时级别较高的组合是鼎、簋、鬲、甗、壶(方壶)、盘、匜。鼎、簋仍然是基本组合形式,甗、壶则只见于级别较高的墓葬之中。本期包括的曾国青铜器批次较多,苏家垅同出九鼎七簋,郭家庙墓地M21、M17带有墓道,这些应当是国君、夫人一级的墓葬,体现出当时曾国正值繁盛阶段。本期的器形一致而略显单调,如鼎多作附耳宽腹饰窃曲纹,鬲皆为折肩饰重环纹、壶作长颈圆腹,簋、盘等圈足器多加有圈足。纹饰多窃曲纹与其他纹饰的组合。本期青铜器多有与就国墓地M2001、M2012^[11]以及晋侯墓地M93、M102铜器^[12]相同的特征,这是确定本期曾国青铜器年代的一个重要标点。同时,本期青铜器一些特征,特别是簋等接近西周晚期周原青铜器,但附耳鼎、折肩鼎不见或罕见于周原,说明其年代不能早至西周晚期。因此本期年代应当在两周之际或春秋初期。

第三期:以随州周家岗墓葬^[13]、枣阳郭家庙M02^[14]等铜器群为代表。本期墓葬发现不多,也未见级别较高的墓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其组合关系比较残缺。从周家岗墓葬看,本期的铜礼器组合仍然是以鼎、鬲、簋、盘、匜为主体。器类上出现有平底鼎,本期特别是本期较晚的时期簋的数量较多,如传世品曾子原簋、曾伯鞮簋、曾孙史夷簋等。本期器物造型多以浅腹、扁体见长,纹饰常见双首曲身龙构成的蟠螭纹,但窃曲纹和垂鳞纹等纹样仍然较多见。本期最为典型的蟠螭纹接近于光山黄君孟夫妇墓^[15],该墓出土的盘、匜形制也与周家岗墓葬盘、匜相同,但黄君孟墓葬的蟠螭纹更为接近春秋中期出现的蟠螭纹。黄君孟夫妇墓为典型春秋早中期之际墓葬,本期年代应当与其接近或略早,即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少数器物年代或晚至春秋中期偏早。

总的看来,第一阶段青铜器特征与相应时期典型的周文化青铜器特征相同。器物组合方面铜礼器以鼎、簋为核心,或加有鬲、圆壶,盘与鬲常常搭配使用,常见鼎、鬲、簋、壶、盘、匜的组合形式,鼎多为奇数,而鬲、簋、壶多作偶数,这与西周晚期周原等周文化中心区域青铜器的情况是一致的,如京山苏家垅出土鼎9、鬲9、方甗1、簋7、方壶2、豆2、盃1、盘1、匜1,除七簋之数比较特别之外,与就国墓地M2001就季墓组合类别大体相似。在装饰上,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垂鳞纹几种纹饰及其形成的组合,也是周原地区和虢、晋等诸侯国青铜礼器常见的纹饰。曾国青铜器的器物、纹饰基本都可以在周原以及与周王朝近缘的诸侯国中找到相似物。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演进过程也与当时的主流技术基本保持一致。在铸件的成形方面,鼎、鬲等三足器多是沿三足分范,以便三足浑铸,同时在三足之间设有底范,相应地,附耳也多是浑铸,附耳处常设芯范,附耳与器口之间设圆梗连接。簋、盘等双耳圈足器多四分外范,范缝设在双耳的两侧,

[8]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9]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10]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关于郭家庙墓地资料均出自此报告。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就国墓地(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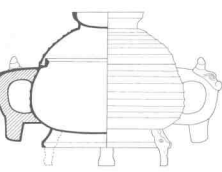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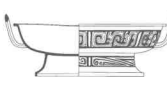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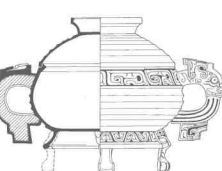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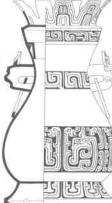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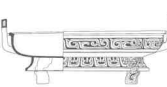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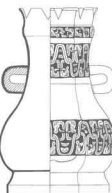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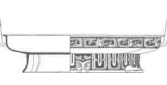
[13]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14] 原始简报见于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又见注释[10]。

[15] 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附图一

	立耳鼎	附耳鼎	甗	鬲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簋	壶	盘	卣
			
			
			

因此这些鋁形耳多是后铸。在第一阶段,簠耳、匜等浑铸的现象稍多,至稍晚的两周之际,先铸鼎足和簠耳的技术得到运用,同时较多地后铸耳、匜。这些技术多为同一时期周文化所应用。观察和X光检测显示,无论是鼎、鬲等三足器还是簠、壶等圈足器,垫片的使用是普遍的,往往一器的器底有5个左右的垫片分布。由于器耳内置泥芯,故耳部或见有泥芯撑。

但是曾国青铜器在第一阶段仍然可见个性特征。例如曾国高级别墓葬的器物组合中不见编钟,方壶和圆壶未见同时并用,曾国也不像虢、晋国那样在实用器之外再随葬一套明器。在器形、纹饰方面,簠与周原同类器同一性较高,即梯形器腹、带耳的曾首形双耳,并以瓦纹与重环纹、窃曲纹形成纹饰组合,而曾国的簠在第一阶段始终保持较稳定的形制而少有变化。曾国铜器还流行一些特定的器形,如鬲几乎都作折肩、肩部以上饰一周重环纹;壶盖顶常立莲瓣形饰。曾国的附耳鼎基本形制是宽浅腹,其上饰一周窃曲纹,而在其他地区如虢国的相应时期,鼎多为立耳,鼎腹更接近半球形,纹饰多是一周重环纹与垂鳞纹并用。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铭文字体、辞例虽然也类似于周原等周文化青铜器,但铭文内容简略而单调,一些称谓、熟语的延用时间颇长,铭文的制作上存在位置、排列等方面的不够规范之处,反映了一个诸侯国在较高层次文化方面的欠缺。

曾国铜器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些个性特征并非为其独有,而是与其邻近的区域特别是南阳、信阳一带的青铜器形成颇有共性的区域文化单元——鄂北豫南文化区。曾国与其东北的黄国交往最密,当时的曾、黄两国女子互嫁、政治上似乎结有同盟。黄国铜器发现于随州熊家老湾、京山苏家垅曾国铜器群之中,曾国青铜器也出土于潢川、罗山等黄国故地。表现在文化特征方面,鄂北豫南地区还常见一些相同的青铜器器类及其器形,例如宽体浅腹的附耳鼎、折腹重环纹高等。这一地区还见有一些颇有个性化的器物,如鬲、方座形器、提梁方首等,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一些特定的句式和辞例。这些情况说明,考古学文化往往是由某一区域而不是由某一族群形成代表该文化的那些共同因素。

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簠,常见鼎、簠(簠)、壶(方壶)、盘、匜的组合形式,纹饰以细密的蟠螭纹为主题。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又主要可分为四期(附图二)。

第一期:以80刘家崖墓葬^[16]、季氏梁墓葬^[17]、八角楼墓葬^[18]为代表。本期器物群不多,保存亦不甚完整,难以观察器群组合全貌。从这一时期的器类分析,当时墓葬随葬品的基本组合为鼎、簠(或簠),鬲、鬲、簠、壶和盘、匜仍然继续使用。本期的鼎已经完全脱离第一阶段的形制而分化为两大类:一类为敛口深腹带盖鼎,一类为浅腹平底敞口的升鼎。升鼎在此后的楚系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目前的情况看,升鼎在曾国的出现时间略早于楚国。盖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全新的器类,它也只是流行于楚系铜器之中。蟠螭纹成为占绝大多数的装饰纹样,蟠螭纹或三角、波曲纹构成单元都是简化而抽象的龙纹,这种龙纹由上一阶段第三期流行的双首龙纹所构成的蟠螭纹演变而来。本期的年代大约延续有较长时间,其中使用鼎、簠组合的器群如80八角楼略晚,其铜器特征与淅川下寺M7、M8^[19]以及当阳赵家湖JM9相同^[20],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季氏梁和80刘家崖年代相对略早,可能仅接上期较晚阶段。

第二期:以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M1、M2^[21]为代表。东风油库M2随葬铜鼎1、簠1、方壶1、盘1、匜1, M1亦见上述诸器,但多出甗1及兵器,身份略高于

[16]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17]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18] 同[17]。

[1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2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市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曾国墓葬》,《文物》待刊。

M2。M1墓主为曾少宰黄仲酉，“少宰”为职官名，据文献，楚设有少宰，如“少宰如晋师”（《左传·宣十二年》）。属于此期的墓葬还有东风油库M3、义地岗放鼎和放盨器物群^[21]和安居汪家湾墓葬^[22]。汪家湾墓葬随葬鼎1、簠2，另见有铅方壶，墓主身份为曾都尹。本期墓葬这几个墓主身份明确，是判断当时曾国国家力量、地位的典型材料。本期铜器的基本组合仍然是鼎、簠，较高级别墓葬加有方壶（壶）、盘、匜，上期流行的盨仍然得以延续。鼎趋于高足深腹、圈足趋宽，表明曾器形演变趋势与楚系青铜器同步。细密的蟠虺纹是本期基本纹样。本期器物形制特征与淅川下寺M10、M11等春秋晚期偏晚阶段青铜器几乎完全相同，年代也属于这一时期。

第三期：以曾侯乙墓^[24]为代表。除了曾侯乙墓之外，本期少见其他等级遗存出土青铜器，而仅有少量零散出土铜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鼎有20件，其中在食具箱内的两件盖鼎不应该是礼器。由鼎形成的组合大约是九升鼎配八方座簋以及鼎形器和小鬲各九件，五件牛钮盖鼎配四簋，其他礼器主要有鬲1、大鬲1、豆2、圆壶2（联禁）、尊缶2、鉴缶2、尊盘1、盘1、匜1，觚形尊是颇为特殊的器类，可能是来自东南地区的影响。另外曾侯乙墓还发现以编钟为中心的65件编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迄今所见先秦时期件数最多的一套编钟，但在此前曾国高级别墓葬中却少见真正意义上的编钟。器形方面，变化主要体现在鼎，其器形由前期的深腹曲足而至本期的浅腹直足。由于等级较高的原因，曾侯乙墓纹饰多使用镶嵌手法，纹饰繁复。我们也因此对一般贵族墓葬的情形缺乏了解。曾侯乙墓随葬有楚惠王五十六年钟，墓葬年代在公元前433年或稍后，即属于战国早期偏晚。

第四期：以擂鼓墩M2^[25]为代表。本期亦未见其他成组青铜器。M2也出土有一套36件的编钟，青铜礼器组合与曾侯乙墓近似，也是九升鼎八方座簋九鬲配置，但与四簋组合的似乎是六件牛钮盖鼎，其他器类有鬲1、大鬲1、方壶2、盥缶2、豆2、盘1、匜1等。本期器物形制表现出与上期紧密的关系而略有变化，升鼎、盖鼎腹部趋浅，器耳外曲。可能因为国势的变化，M2青铜礼器数量和等级与曾侯乙墓相当，但质量和精致程度已不能同日而语。擂鼓墩M2的年代晚于曾侯乙墓而早于战国中期偏晚的包山M2^[26]，属于战国中期偏早^[27]。

较之第一大阶段，第二大阶段曾国青铜器主要变化发生在器物组合和装饰的基本纹样变化方面。这一阶段的核心组合为鼎、簠、带盖斂口鼎鼎足趋高，虽然有第一、二期深腹和第三、四期浅腹扁体之别，但自成一体发展系列是清晰的。升鼎和簠的形制变化比较稳定，升鼎趋于扁宽而簠趋于方高。细密而抽象是第二阶段纹样的基本风格，在布局上呈单元格地拼合和重复，反映了这一阶段纹饰制作技术的变化。

在铸造技术方面，分铸技术的普遍运用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为细化了铸造技术的分工，分铸使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提高。在春秋中晚期，先是鼎足、其后发展到鼎耳、钮普遍先铸。后铸盨、簠等器耳的铸接技术运用甚至更早一些，至战国时期，一些鼎的足、耳也开始后铸，后铸取代先铸大约是为了降低技术难度。另外，垫片的大量使用也是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之处，簠等容器常常可见垫片布满器壁，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技术特征。

曾国青铜器以上特征和变化与同时期楚文化青铜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始于第二大阶段第一期，直至第四期的曾国青铜器亦是如此。如果我们将这几个时期的曾国青铜器分别与相应时期的下寺楚墓、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28]、包

[22] 陈欣人、刘彬徽：《古盨小议》，《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23]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24]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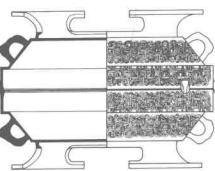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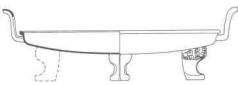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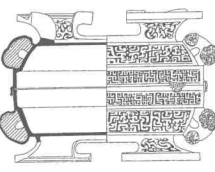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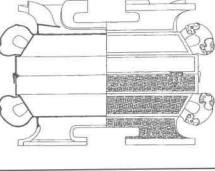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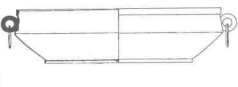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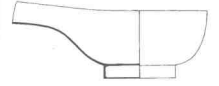
[26]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7] 刘彬徽：《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初论》，《文物》1985年第1期。

[2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附图二

	升鼎	附耳鼎	甗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簠	盘	匜
		
		
		

山和天星观楚墓进行比较,会发现这种一致性从组合、形制、铭文直至铸造技术各方面都十分强烈。因此从更高的层次上看,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特征的变化主要是曾国青铜文化从脱离周文化的发展体系转而进入楚文化青铜器体系。

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同样也与典型楚国青铜器存在一些差异。已经有学者指出,曾器中不见典型的楚式器类铜敦^[29]。同时,曾国常使用风格朴素的方壶也少见於楚国青铜器中。曾国青铜器铭文字体长方,一些铭文的辞例也有一些不同于楚国的个性特征,铭文中有时还使用一些特殊的字形。曾国与楚国铜器的差异同样也是反映了一个较低层次文化的相对单一的水平。在春秋晚期,曾国青铜器铭文几乎无例外地使用“某人之某器”句式;既使是在曾侯乙墓,其礼器和用具的119处铭文中,117处铭文为“曾侯乙𠄎時用终”。

虽然曾国青铜器在两大阶段之间亦即春秋中期前后区别明显,但一些因素存在明显的承接关系。例如,平底束腰升鼎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典型器,其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青铜器。属于第二大阶段第一期80刘家崖出土的平底束腰鼎,铭文有“盥之登鼎”,学者认为登即升,故登鼎即升鼎^[30],盥鼎的年代早于早期形态的楚式升鼎如克黄鼎^[31]。80刘家崖鼎显然来自于第一大阶段第三期的周家岗鼎^[32],后者是西周晚期周文化系统附耳垂腹鼎的延续形式。又如,长颈垂腹圆壶是南阳盆地至随枣地区相对集中出土的器类^[33],此类壶在曾国铜器第一大阶段常见,并形成如莲瓣冠形饰等传统特征,这种造型和装饰特征也影响到方壶之中。在第二大阶段青铜器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期如80刘家崖圆壶、第四期擂鼓墩M2方壶、75刘家崖采集方壶都保持有带冠的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其后该地区的枣阳九连墩楚墓方壶^[34]。

总体看来,曾国青铜器在第一阶段表现出周文化特征,第二阶段剧变而表现出强烈的楚文化特征。这样,曾国青铜文化自始至终处于一种亚文化的地位。这样的文化地位反映在青铜器上,就是——也必然是——器类、器形、纹饰和铭文内容的单一性和程式化。例如,曾国青铜器第一阶段的附耳鼎总是模式化地作窃曲纹宽体浅腹,下接夸张的兽蹄形足;而在第二阶段的春秋晚期,曾国青铜器铭文几乎无例外地使用“某人之某器”句式;在战国早期曾国级别最高的曾侯乙墓,在其礼器和用具铭文中,反复使用“曾侯乙𠄎時用终”。这种情形在东周其他较小的诸侯国之中也是颇有代表性的。

曾国青铜器在两个不同阶段又同时保留有一些自身的个性特点,反映出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文化背景,第一阶段是在西周晚期周王室日渐衰微之时,各诸侯国青铜器开始勃兴并逐步形成一些自身特色,曾国青铜器如此,当时的秦、晋青铜器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个性因素。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独立性是在楚文化日益强势的冲击下所保留的传统和独创性。此外,从曾国青铜器的发现情况也可以大体反映出这两个不同的背景:两周之际和春秋之际前后两个时期,曾国青铜器被发现的批次最多、等级最高,暗示这两个时期曾国相对繁盛,而春秋晚期开始的繁盛是在经历了春秋中期最为低潮的阶段后取得的。

二

曾国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除集中于随州、枣阳一带之外,还见于湖北京山、襄阳、河南淅川、新野、桐柏、罗山、潢川、安徽寿县、江苏六合、四川成都等

[29]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30]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31] 同[28]。

[32] 叶植:《楚式鼎当议》,《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

[33]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俞伟超主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3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年第7期。

地。如此广大的区域显然并非都是当时曾国的疆域范围。但通过目前已知的材料,已有条件对曾国疆域问题进行探讨。

曾国青铜器及其反映的曾国疆域的确定与定位颇为复杂。由于出土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曾、缙(或作郢)国各不止一个,过去有学者将曾国青铜器分别划归不同的“缙国”^[35],也有学者将随枣走廊一带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一概归入曾国青铜器^[36],更多人则是将带有曾国铭文铜器的铜器群及其所在区域都归入曾国青铜器和曾国疆域。但是,带有曾国铭文的青铜器,并不能代表同出的青铜器群均属于曾国青铜器,出土地域当然也未必一定属于曾国疆域,而是需要具体分析其文化背景。我们的考虑是:如果某区域有性质明确的典型曾国青铜器群(如苏家垅)发现,或者带有曾国铭文的铜器在某时间段有多次出土,则该区域相关时期可能属于曾国疆域,出土的其他铜器群也可视为曾国铜器。

迄今曾国青铜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分别位于不同的水系流域范围内(附图: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

1、湖北京山北部的漳河上游谷地。漳河河谷地处大洪山脉南麓,河水东南流向并在今云梦境内入注湖水,其上游地区是宽不足500米的狭窄河谷。1966年京山坪坝镇苏家垅水利建设中出土两周之际青铜器97件,从出土器物组合及车马器的情形看,这批铜器应该属于一座墓葬。铜器中有鼎9、鬲9、簋7等33件容器,这是在郑韩故城发现之前西周春秋九件列鼎出土唯一明确的实例,用鼎级别之高超过当时的晋、虢、应等国顶级墓葬。苏家垅铜器群十件不同的有铭器中,鼎、豆、壶等六件有“曾(侯)仲辟父”铭文,因此辟父应该是这批青铜器的所有者无疑。1973年距苏家垅不远的坪坝镇檀梨树村又发现曾子单鬲、曾太师鼎各一件^[37],时代在西周晚期。以上两个地点出土青铜器所反映的社会等级都很高,说明漳河上游是当时曾国一个重要区域。但在第二大阶段之后,这一带未再与曾国相关的遗存。

2、湖北枣阳中南部的滚河中游地区。滚河西流入注汉水支流唐河,其南北两岸为较低平的岗地,在滚河北岸由段营到东赵湖地区曾多次发现曾国青铜器。1972年枣阳熊集镇段营一座两周之际墓葬中出土285件青铜器,其中包括鼎3、簋4、壶2等容器,一件鼎有“曾子仲读”铭文^[38]。1982年在段营之东约15公里的吴店镇东赵湖又采集到“曾侯絳白”戈^[39],年代约在春秋早期偏晚。这两件有铭铜器的发现说明滚河流域当时应当是曾的疆域范围。东赵湖一带包括曹门湾、郭家庙,这里大约为曾国的墓葬区域。1972年在东赵湖村曹门湾出土鼎2、簋2^[40],1983年1月,农民在曹门湾之东发现铜鼎1、簋2、圆壶1^[41],这些青铜器大约都出自墓葬。在与曹门湾毗连的郭家庙,2002年,襄樊市考古队发掘了25座墓葬,墓葬出土铜器器类主要有鼎、鬲、壶、盘、匜,另外钺、方座器是两周之际不多见的器类。郭家庙铜器中有铭的曾器包括曾孟颀鬲、曾巨曼非录鼎、曾伯随钺,其中曾伯随钺同人所作之器见于传世品曾伯随鬲^[42]。这样,可以认定郭家庙、曹门湾墓葬作为曾国墓地的性质。郭家庙墓地除曾国铜器之外还出土有卫、幻国铜器,显示出墓地级别很高。该墓地早期严重被盗,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83年4月,农民在东赵湖发现鼎1、鬲2,后经过调查发现也是出自郭家庙墓地的墓葬^[43]。

郭家庙墓地的年代下限相当于第一大阶段第三期,这大体就是曾国在滚河流域活动的最后阶段。根据文物普查资料^[44],春秋早期之后的滚河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楚文化的特征,这与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楚人东进的时代背景

[35] 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年1期。

[36] 见注释[3]杨宝成文。

[37] 杨叔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4月。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曾子单鬲、曾太师鼎出土背景已不明,二器不能确定为同出。

[38]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39] 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40] 同[38]。

[41] 同[39]。

[4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721,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43]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关于郭家庙墓地资料均出自此。

[44] 叶植:《襄樊市文物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



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
(未包括四川新都、安徽寿县、
江苏六合)

吻合^[45]。

3、湖北随州中部淅水中上游地区。这里是随枣走廊的东段，地势略为开阔，淅水支流南北分布，分别构成穿越大洪山、桐柏山的交通孔道。曾国青铜器又以下三个区域较为集中：

1) 淅水南部支流均水中上游河谷的均川一带。1970年和1972年均川熊家老湾出土的两批青铜器包括有“曾伯文”簋、觚，“曾仲大父蚡”簋和“黄季”鼎。曾伯文簋出土四件，原组合形式可能是五鼎四簋。黄国铜器在苏家垅也有发现，大约都是用作黄女嫁曾的媵器^[46]。熊家老湾附近还发现有年代相当的陈家湾遗址。这些遗存可明确自西周晚期后这里属于曾国疆域的事实。此后，曾国活动在均水一带仍然延续。1975年，邻近熊家老湾的刘家崖发现多件青铜器^[47]，其中有几件“连迂”所作的青铜器。1980年，刘家崖同一地点一座被盗墓葬中发现铜器27件以及玉器、陶器、金箔等，其中铜器有鼎2、鬲4、圆壶2、编钟5等，鼎、圆壶、戈有“盅”、“盩叔”等铭文。刘家崖这两批青铜器年代在第二大阶段第二期。此外，刘家崖还采集有年代在此前后的铜鼎、簋以及战国时期的方壶等，结合调查情况可知，刘家崖是一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地。从铜器及铭文特征看，其性质应属于曾国。墓地未出土带“曾”字铭文铜器，应当与春秋中期后铜器铭文辞例多私名、少国族名的情况相关。

2) 淅水与北部支流淅水交汇地带，即今随州城区一带。这一区域包括有派

[45] 《左传》桓公六年、八年都记载有楚武王伐随国。

[46] 传世品曾侯璺有“叔姬雷作黄邦，曾侯作叔姬邓媵器簋葬”（《集成》4598）。

[47]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